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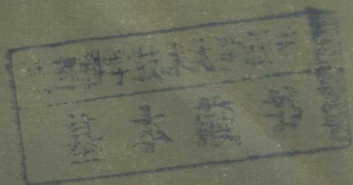
616270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拉吉舍夫著

0821

5042



646270

0321
5048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俄〕拉吉舍夫著

汤毓强 吴育群 张均欧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А. Н. РАДИЩЕВ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ИЗ ПЕТЕРБУРГА В МОСКВУ

译自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49年版《拉吉舍夫选集》

封面设计：张 朋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172,000 开本 787×1092毫米¹/₃₂ 印张 8⁵/₈ 插页 3

1982年2月北京第1版

1982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20,000

书号 0208·86

定价 0.73元



作者像

译者前言

一七九〇年六月二十六日，俄国女皇叶卡德琳娜二世得到一本没有作者署名的书《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以下简称《旅行记》），读了几十页，她就明白了，该书抨击的矛头是指向她本人和她的统治的。女皇严令立即找出书的作者。过了几天，作者被找到了，立即逮捕了他。警察局奉命搜查并没收这本流传在外的书，但人们把书隐匿起来，私相传抄，流传全城。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何以使女皇如此震怒？作者是何许人？

作者就是列宁引以为骄傲的、俄国解放运动史上第一位革命家拉吉舍夫。列宁在《论大俄罗斯的民族自豪感》一文中写道：“我们看到沙皇刽子手、贵族和资本家蹂躏、压迫和侮辱我们美丽的祖国而感到无限的痛心。我们感到自豪，因为这些暴行在我们人民中间、在大俄罗斯人民中间引起了反抗，因为这些人民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十二月党人、七十年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因为大俄罗斯工人阶级在一九〇五年创立了一个强大的群众性的革命政党，因为大俄罗斯农夫当时已开始成为民主主义者，开始打倒神甫和地主。”^①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吉舍夫于一七四九年八月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六一〇页。

二十日生在莫斯科一个贵族家庭里，童年是在萨拉托夫省库兹涅茨克县上阿布利亚佐沃村父亲的庄园里度过的。拉吉舍夫八岁时被送去莫斯科求学。一七六二年叶卡德琳娜二世即位，在莫斯科举行加冕典礼。女皇命令，从贵族子弟中选送四十人入贵族军事学校。拉吉舍夫被选中了，来到彼得堡沙皇宫中。贵族军事学校的学员其实就是宫廷侍从，住在宫中，一面学习，一面当差。在两年多的时间内拉吉舍夫目睹了宫中穷奢极侈的生活、女皇的虚伪、大臣们的尔虞我诈、争权夺利、谄媚逢迎、不学无术、精神空虚。叶卡德琳娜伪装开明，成立新法典编纂委员会，准备改革法制，为此需要一批有高度学术水平的法学家，便选送十二人去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拉吉舍夫是这十二人中的一个。一八七一年学成归国，这时叶卡德琳娜改革法制的“热情”已经冷却，有高度学术水平的法学家也被遗忘了。拉吉舍夫先后在枢密院、军事法庭、贸易部供职，直到被捕。在此期间他写了《给一个住在托波尔斯克的朋友的信》、《自由颂》、《乌沙阔夫传》、《闲话祖国之子》、《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旅行记》是拉吉舍夫的中心著作。

《旅行记》卷首有一段题词：“这头怪物身躯庞大，肥胖臃肿，张开百张血盆大口，猖獗而吠。”这头怪物就是专制农奴制俄国的形象。题词表明了该书的主题思想。

拉吉舍夫把自己的作品献给在莱比锡留学的同学阿列克赛·米哈伊洛维奇·库图佐夫。在代替序言的献词中，作者说明了写作该书的目的和任务。献词中写道：“我举目四顾，

人们的苦难刺痛了我的心。我们心自思，我发现，人们所遭受的不幸原是人们自己所造成，而且往往只是由于人们未能正视周围的事物。……我发现人的拯救者就是他自己。‘揭去翳障，睁开眼睛，就能幸福。’……我觉得任何人都能够造福他人，……就是这种思想激励我写下这部作品。”使人们睁开眼睛，认清自己受苦受难的原因，激起人们对苦难深重的人民的同情，寻求志同道合之士共同奋斗，这就是拉吉舍夫写作《旅行记》的目的和任务。

《旅行记》是以旅行笔记的形式写成。在十八世纪欧洲的感伤主义文学中，旅行记是颇为流行的体裁，一般都是描写大自然风光，名胜古迹，抒发人物的内心感受。拉吉舍夫利用这一体裁则是为了广泛地反映专制农奴制俄国的现实。在拉吉舍夫的书中，旅行者每经过一个驿站，便把所见所闻所感记下。全书二十六章除个别章节外，均以沿途所经驿站的名称作为标题。各章之间并没有情节上的联系，都可以独立成篇，但其中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对专制农奴制的揭露和革命的思想贯穿着全书。

《旅行记》是一部包罗万象的书，政治、经济、宗教、法律、道德、文化、教育、家庭、婚姻等问题无一不在书中提出。基本的问题是农奴制问题。作者从各方面表现了他对农奴制的否定态度。旅行者上了路，“马儿拉着我飞驰，我的马车夫唱起歌来，歌声照例是悲怆而忧郁的。熟悉俄罗斯民歌的人都承认，这歌声中流露出一种心灵的悲哀。几乎所有民歌都是软绵绵的调子。”悲怆而忧郁的民歌就好象是全书的序曲，由此展开了人民苦难的情景。旅行者足迹所至，到处都可看到

贵族地主对农奴的残酷压榨和人民无边的苦难。星期天，在柳班，旅行者看到一个农民在烈日炎炎的中午耕着地，交替使用两匹马，马歇人不歇。显然，这个农奴是在为自己耕作。农奴告诉旅行者，一星期有六天他要为地主服劳役，只有星期日和夜晚的时间是自己的。他承认，他为地主干活并不这样尽心着力。这就从经济上说明，农奴劳动的生产效率必然是很低的。地主所以能如此残酷地剥削农民，因为有法律的保护。法律规定地主有权奴役农民，而农民则完全被置于法律保护之外。旅行者愤慨地说：“地主的农民在法律上不是人，除非他们犯了刑事罪，才把他们当人审判。只有当他们破坏社会秩序、成为罪犯的时候，保护他们的政府才知道他们是社会的成员！”旅行者警告地主们：“发抖吧，残忍的地主！在你的每一个农民的额头上我看到对你的判决。”

《扎伊佐沃》再一次证实了《柳班》中提出的观点。一个八等文官衣锦还乡，购置了一个田庄，榨取、欺压和凌辱农民，无所不用其极。他的一个儿子看中了一个农民的未婚妻，企图在他们结婚那天强奸她。新郎及时赶到，救出了未婚妻，把贵族少爷痛打了一顿。老地主反而命人把新郎父子带来鞭打，将新娘交给他的儿子。新郎不能眼看未婚妻被凌辱，便不顾一切地冲出去，夺下了未婚妻。三个贵族少爷追去，新郎进行自卫，村里农民闻声赶到，当场把贵族父子四人打死了。按照法律，农民是杀人犯，应该受到惩处。这一事件证实了“农民在法律上不是人”这一论点，同时也证明：农民到忍无可忍时，必将奋起反抗。审理这一案件的庭长认为，农民是杀人凶手，但他们是被迫自卫，而自卫是人的天赋权利，因此农民是无罪

的。庭长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由和平等的，理应享有平等的权利。当初人们为了生存，结合成为集体，自愿把自己的权利转交给集体，从而限制了自己的自由，于是产生了社会权力或国家。国家应当保护公民及其权利。如果国家不能保护公民，公民就可以运用自己的天赋权利。持这种观点的庭长自然不能见容于官场，只好愤而辞职，“去为农民的悲惨命运哭泣”。庭长的观点无疑就是拉吉舍夫的观点。显然，拉吉舍夫是卢梭的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的拥护者。拉吉舍夫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者一样，不明白也不可能明白国家的起源及其作用。他们不知道，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只有马克思才第一次科学地论证了国家的起源和作用。但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者的思想无疑是反对封建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的有力武器。

《上伏洛乔克》表现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某地主弃官务农，买了一个拥有一、二百农奴的田庄。他“把农民当作既无意志又无愿望的工具”，夺取了农民的份地和草场，强迫农民及其妻女终年为他干活，每月只发给一定数量的口粮，没有家室的农民则连口粮也得不到，只能集中在老爷院子里喝菜汤。作者号召农民：“为了仁爱，你们应该惩处这个社会的恶棍！捣毁他的农具，烧掉他的干草棚、谷物烘房和粮仓，把灰烬撒到他折磨农民的土地上！”

在农奴制的敲骨吸髓的剥削下，农民过着悲惨的生活。《彼什基》描绘了农民赤贫的可怕景象。农民吃的面包中四分之三是麸皮，四分之一是没有筛过的粗粉，农民家中“四堵墙

的上半截和天花板都被烟熏黑了；地板尽是裂缝，上面积了足足一寸来厚的尘土；火炉没有烟囱……无论冬夏，每天早晨满屋子都是烟，蒙着猪尿泡的小窗到晌午才能透进一点微弱的光线。两三只瓦罐（如果其中有一只每天都能盛满稀稀的菜汤，这户人家就算很幸福了！）……桌子是用斧子砍成的，每逢节日才用刀刮一刮……如果家里养有猪或小牛，屋里还有个食槽，人就和牲畜睡在一起，呼吸污浊的空气，点着的蜡烛就象在浓雾之中，或者象隔着一道帷幕……”作者愤怒地喊道：“贪婪的野兽，贪得无厌的吸血鬼，你们给农民留下了什么？只有你们无法夺走的空气。是的，只有空气！”

地主的残忍莫过于《铜村》中描绘的拍卖农奴的场面了。某地主吃光、用光或赌钱输光了家财，便拍卖自己的农奴。在被卖的农奴中，七十五岁的老家人曾在战场上冒死救过老主人的性命，后来又救过少爷本人的命；老人的妻子是少爷母亲的奶妈，少爷自己的保姆；老人的儿媳是抚养少爷成人的奶妈；老人的孙女手里抱着一个孩子，是她被少爷强奸后生的，是少爷的亲骨肉，也被一起拍卖了。此情此景“即使铁石心肠，也无不为之心酸”。

所有地主全都这样残暴冷酷吗？不是也有一些善良的地主吗？《戈罗德尼亚》回答了这一问题。青年农奴万尼亚，天资聪明，老爷对他另眼相看，让他和自己的儿子一起受教育，伴随儿子出国留学，答应归国后给他自由。少爷学成归国，结了婚。女主人是一个专横残暴的女人，肆意侮辱他，强迫他娶被她的侄子奸污并怀了孕的婢女为妻，万尼亚誓死不从，被送去当兵。拉吉舍夫认为，象老主人这种善良的地主是有的，但

他并不能改变万尼亚的悲惨命运，相反，更加深了万尼亚的痛苦。万尼亚说道：“我常常埋怨我那已故的恩人，因为他给了我一颗善感的心。我最好还是成为一个愚昧无知的人，永远不会想到，我也是一个人，和所有其他人是平等的。”拉吉舍夫由此得出结论：不能指望地主的善良，只有农民自己起来砸烂奴役的枷锁。

地主之所以拥有无限的权力，之所以能残暴地奴役农民，因为有政权的支持，有法律的保护。专制制度是农奴制的支柱，农奴制是专制制度的基础，两者相互依存。拉吉舍夫在揭露农奴制的时候，不可能不同时抨击专制制度。在《旅行记》中专制制度是与农奴制度并行的另一个基本主题。对专制制度的抨击和对农奴制的抨击交替出现。

《丘多沃》中的官吏的残忍冷酷并不亚于地主。二十个人在海上遇难，濒于绝境，请求当地长官予以援助。长官正在睡觉，对此置之不理。他振振有词地说：“这不是我的职责。”彼得堡的一个官员也说：“可是在他的职务中并没有明文规定他必须救援你们呀，”他们的职责是什么呢？“把弱者折磨至死，向上司谄媚逢迎。”这就是他们的职责。作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欧洲，在京城附近，在伟大国君的眼前，竟然会发生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是可能的吗？”

紧接在《丘多沃》之后的《斯巴斯卡亚·波列斯季》对此作出了回答。这一章是全书的中心篇章，是揭露专制制度最尖锐最深刻的一章，揭露的矛头直指沙皇及其宫廷。这一章由三个独立而又互相联系的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揭露达官贵人滥用职权，侵吞公款，胡作非为。旅行者听到一个财务局的小

官吏跟他的妻子在谈论，一位总督嗜吃牡蛎，经常派遣特使千里迢迢去彼得堡采购，一应费用均由国库负担。特使因“完成任务准确无误”而获得奖赏和升迁。上行下效，贪污盗窃相沿成习。小官吏揭露总督，可是他自己手上也并不干净。第二部分叙述不公正的法律把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害得家破人亡。这一切罪恶的根源何在呢？第三部分表明，根源就在于最高政权，在于沙皇本人，在于专制制度。旅行者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成了沙皇。宫廷富丽堂皇，威严雄伟。众大臣竟向沙皇献媚逢迎，歌功颂德。沙皇都信以为真，自以为是英明的君主。真理女神撕下了他眼睛上的翳障，使他看清了真实的情况。“我那闪闪发光的衣服原来沾满了鲜血，浸透了眼泪。我的手指上沾满人的脑浆；我的双脚陷在污泥之中。站在我周围的那些人更卑劣难看。他们的心肝是黑的，燃烧着惨淡的贪婪之火。他们向我投来邪恶的眼光，眼光中充满了凶狠、妒忌、阴险和仇恨。我派去征讨的统帅沉溺于骄奢淫逸的生活。军中纪律不明，兵士的待遇不如牲口。……”叶卡德琳娜的宠臣波将金一眼就看出，这里所说的统帅就是指他，叶卡德琳娜也看出这里讽刺的正是她本人和她的宫廷。她怒气冲冲地批道：“作者存心恶毒……乳臭小儿居然教训老娘……第八十一页全是诅咒、辱骂和恶毒的歪曲，以下各章也莫不如此。”叶卡德琳娜自诩为“开明君主”，“皇位上的哲学家”，拉吉舍夫彻底撕下了她的假面具，怎能不使她怒发冲冠？！沙皇本人就是“社会上的元凶，最大的强盗，最大的叛徒，公众安宁的首要破坏者，把自己的狠毒注入弱者内心的最凶恶的敌人”。这就是拉吉舍夫对“为什么在伟大国君的眼前竟然会发生这种惨无人

道的事”的回答。

专制制度象瘟疫，它的统治到达哪里，那里的生活就被窒息。《诺夫哥罗德》证明了这一点。诺夫哥罗德原是一个强大的自由的共和国。“古语云：‘谁敢反对上帝和诺夫哥罗德’，可为其强大的证明。”莫斯科的沙皇征服了诺夫哥罗德，这里的生活就停滞了。“一五〇〇年……一六〇〇年……一七〇〇年……诺夫哥罗德依然如故，停滞不前。”

专制制度甚至扼杀人们的“理性、机智、想象力以及一切伟大和优美的东西”。《托尔若克》抨击了书报检查制度，证明在思想和精神的王国里审查有百害而无一利。审查“只能给教育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害，使智慧多年不得发展。它禁止有益的发明和新颖的思想。”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政府禁止出版自由，并不是因为害怕人们亵渎上帝，而是怕人们反对政府。”但这是徒然的，最后只能是自食其果。“那时仅仅一种思想就足以动摇它的基础，真理的声音就能摧毁它，而英雄的行动将把它彻底消灭。”拉吉舍夫认为：“检查书报的权利应该属于整个社会。社会自会给作者戴上桂冠，或者拿他的书页去包装什物，正如给予剧作者以奖励的是观众，而不是剧院经理一样。书报检查官对于问世的著作既不能给予光荣，也不能给予恶名。……把愚蠢的书籍交给公众去自由评论，它会找到成千的检查官，最严厉的警察机关也不能象愤怒的读者公众那样有效地禁止思想的垃圾。”

在专制农奴制的黑暗王国中，处处事事都使旅行者感到愤慨，忧伤，但旅行者也看到了光明和希望。这光明和希望的体现者就是人民。《柳班》那个农民的勤劳不能不使人感动。

《扎伊佐沃》中农民们同仇敌忾，团结战斗，当场把贵族父子打死的场面令人痛快。《戈罗德尼亚》的农奴瓦纽沙聪明好学，各方面成绩都比小主人好，连老主人也承认：“你的学业和品行都比我的儿子更有长进。”如果说在这些章节中作者还只是顺便提到农民的优秀品质，那么《叶德罗沃》一章则集中表现了农民的优秀品质。拉吉舍夫对比了两种类型的美，赞颂了人民的美。旅行者遇到一群农村姑娘，作者热情地写道：她们“都穿着节日的盛装，袒露着颈项，赤着脚，光着臂膀……眼光欢乐，脸颊上浮现出健康的气色，皮肤虽因严寒酷暑的侵袭而显得粗糙，却有一种纯洁坦率的美丽，她们都在青春貌美的年华，嘴边洋溢着微笑，或发出真诚的笑声；露出一排比象牙还洁白的牙齿。她们的牙齿会使花花公子神魂颠倒。”而贵族小姐则束胸缚腰，以致身体畸形发展，甚至死于分娩。拉吉舍夫肯定人民的美的标准，在俄国美学思想史上有很大意义。十九世纪中叶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也作出了同样的结论。拉吉舍夫不仅赞颂人民的体格的美，而且表现了人民的道德的美。他突出地表现了农家姑娘阿纽塔的勤劳、诚实、纯朴、坦率、真挚而纯洁的爱情。贵族有一种偏见，认为农民不懂得爱情，不会爱。拉吉舍夫推翻了这种偏见，而且证明，农家姑娘的爱情才是纯洁的、没有利害打算的真正爱情，比贵族小姐的爱情高尚得多。

农民的高尚品德使拉吉舍夫增强了希望和信心。这样的人民是不可能永远忍受专制农奴制的压迫的。作者一再指出：“农民在法律上不是人，”现在他欢呼：“不，不，他是人，他将永远是人，只要他愿意……”这句话的含意是不难看出的。

对此叶卡德琳娜批道：“值得注意，有煽动叛乱之意。”

但是拉吉舍夫并没有把农民理想化。农民身上也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和消极面。《索菲雅》中描绘了“一个垂头丧气到小酒馆去而回家时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纤夫”的形象。《铜村》中一个青年农奴平日逢迎主人，伴随主人为非作歹，最后自己也被拍卖了。作者怒斥他不仅在地位上是奴隶，在精神上也是奴隶。《瓦尔达伊》讲述了当地少女们的淫荡风习。拉吉舍夫清醒地看到，这一切的根源是农奴制度，是老爷们的腐蚀性影响。“到贵族家里去当差，那就更容易学坏。上等仆人学老爷的样，下等仆人又学上等仆人的样，淫乱的恶行就是从他们传到乡村去的。”但是人民身上的消极面并不是俄罗斯人民的典型特征，并不是俄罗斯的民族性格。

俄罗斯人是忧郁而富于忍耐性的，但“当他高兴时，他容易冲动，勇敢而好争斗。如果有什么不合他的心意，他便马上同人争吵或打架”。拉吉舍夫认为，这是俄罗斯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的人民“能够解决俄国历史中留到今天的许多疑难问题”。这许多问题是什么问题？首要的当然是专制农奴制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拉吉舍夫的回答是：举行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的主题贯穿着《旅行记》全书。拉吉舍夫认为农民有权对压迫者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如果我打了人，人就可以还手。”自卫是人的天赋权利，因此是无罪的。作者在《铜村》中作出结论：“能够给人自由的都是世袭的大地主，休想期待他们会主张自由，只能指望沉重的奴役产生自由。”这一结论的真意是不容置疑的。拉吉舍夫预言，农民起义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他们等待着时机。钟声在响，毁灭的狂澜

将一发而不可收拾。我们在周围看到的将是刀光剑影，我们的严酷而惨无人道的行为的酬报将是烧和杀。”在《自由颂》中，拉吉舍夫兴奋地幻想出人民起义的动人场面：

战斗的队伍风起云涌，
希望武装了所有的人；
人人争用沙皇的鲜血，
把自己的耻辱洗尽。
我看到处处是刀光剑影。
死神变化成各种幻形，
飞翔在沙皇高傲的头顶，
欢呼吧！被束缚的人民！
大自然赋予的复仇权利，
已把沙皇带上断头台处刑。

胜利了的人民对沙皇进行了审判，历数他的罪状，处死了沙皇。但是，拉吉舍夫不是一个浪漫主义的革命家。他清醒地看到，这是“整整一百年以后的事情”，因为人民没有正确的领导，人民还没有足够的觉悟，没有明确的目标。“他们寻求复仇的欢乐，有甚于挣脱枷锁的好处。”历史证明了拉吉舍夫预见的正确。

但是，拉吉舍夫的人民革命思想并不是始终如一的，而是有矛盾的。这在《霍季洛夫》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认识到统治阶级是不会自动放权力权的，“休想期待他们会主张自由”，但他又恳切地劝说地主们主动解放农奴，给他们自由。他时而以“上帝的睿智和仁爱”晓谕地主们，向他们“启示奴役的不

义”，要求他们回心转意；时而以人人人生而平等的天赋人权理论开导他们；时而向地主们陈述奴役制度的危害。他号召农民起义，却又以农民暴动威胁地主，如果地主不及时解除农奴身上的枷锁，那么“第一个诱惑者或仁人志士一旦出现，鼓动不幸的人们，便能酿成大乱，当心点！”《霍季洛夫》是全书唯一具有自上而下推行改革的色彩的一章，但它并不能掩盖全书的基调，贯穿全书的基调是革命，是号召人民起义。

何以解释拉吉舍夫思想中的矛盾呢？拉吉舍夫认为人民革命不可避免，祈求革命早日到来，但他清醒地看到在最近的将来革命胜利是没有希望的，不久前发生的普加乔夫起义的失败证明了这一点。革命胜利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是“整整一百年以后的事情”。难道让农民再忍受一百年的压迫吗？有没有别的出路呢？拉吉舍夫在《未来的蓝图》中设计了说服地主自动解放农奴的方案。列宁在论述俄国解放运动第一阶段的贵族革命家时说：“起初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这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①列宁清楚地指明了贵族革命家的阶级局限性。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贵族革命家的圈子是狭小的，那么在十八世纪拉吉舍夫的时代连这种狭小的圈子都不存在。同样远离人民的贵族革命家拉吉舍夫又能设计出什么别的方案来呢？

拉吉舍夫确信人民革命必将胜利，革命胜利后俄国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呢？《自由颂》表达了拉吉舍夫的政治理想：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二二页。